











我的起居室里，悬挂着一个条幅，遒劲的行书写出一首五言绝句：“樱花红陌上，柳絮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这情致委婉的诗句，是青年周恩来旅居日本时的作品，表现了他对祖国对亲人的深切怀念。前年我在东京应邀赏樱时，默诵这樱红柳绿的诗句，更体会到它描写得何等恰切，何等洒脱而意味深长，无疑地是可以长期流传人们的佳句。青年周恩来很有才华，这是大家知道的。我说的这张条幅，是青岛的一位业余书法家修德同志写的。五年前我在青岛疗养院养病时，他写了装裱了，托友人刘侠同志转赠给我。五年来朝夕相对，过目默诵中也寄托了我的无尽怀念之情。

#### 他的右臂果然康复了

我开始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8年春天的武汉。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形成，以郭沫若同志为首、包括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主持抗日宣传工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已经成立并开展工作，有力地推进了武汉三镇民的抗日热潮。我当时是第三厅文艺宣传部门的年轻工作人员，协助史东山、洪深同志从事十个抗敌演剧队的整编和集训。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也是在武昌田家窑客室里，谈的是演剧队问题。第三厅的工作，是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可是除了会议中听他作报告外，我同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后来接触较多，能够多次听取他的教益的，是1940年在重庆时。这年5月，听说周恩来同志从苏联治疗臂骨归国，经延安回到重庆，我急切地请冯乃超同志带我到曾家岩去看他。相见之下，他问我的膀子是否治好了，我同他的臂骨治疗得怎样。原来，1939年1月，我在晋西游击区里马受伤，左臂关节粉碎性骨折，在延安没治好，5月被转送成都。成都的医院要给我做截肢手术，但至少要在半年以后。我等不及，稍后来到重庆。因此我的左臂一直是残废僵直，可也习惯了，不去管它了。那时西医骨科大夫治法手术的原则是：髓断医端（虽不能弯，可以步行），手术断骨（虽不能伸，可以写字、穿衣、吃饭）。周恩来同志是1939年6月在延安继续马受伤的，做的是右臂手术。他去莫斯科得到周到的医治，可是右臂果然痊愈了。那时他一直记住大夫的叮嘱，有空便使用左手将右手臂向外向左推搡。他说：“我这样每天练练，过些时候可以慢慢恢复。”全国解放后我才相信：我们都耽误了。要是新伤不久就求教于西安或成都的专治殴打损伤的老中医，本来是可以治好的。

从周恩来同志回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后，直到次年2月我离开重庆前，我在周恩来同志和冯超同志领导下工作。那时我除参加第三厅（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部分工作外，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活动。周恩来同志要沙汀、以群和我组成一个小组，以沙汀同志为组长，进行文艺界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文协、老舍等同志进行一些沟通和联络的活动。这样，我们三人每两周到曾家岩向周恩来同志请示汇报，主要是听他谈论敌友发展情况，党中央和南方局有关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示。在重庆时期，常有幸听到周恩来同志在文化界的大型或中型会议上作有关国内政局、战局的报告，有时是文化问题的讲话。他把新讲的材料与观点结合得那么好，把党中央的声音阐述的那么深切，那样精确的记忆力、逻辑性、雄辩性和

## 北京饭店员工回忆周恩来同志

本报记者 刘 霄 徐建中

周恩来，始终是一个号召，一面旗帜。

不久前，我们从北京饭店五位同志深情回忆中，再次敬仰周总理的崇高品德。他们是：北京饭店总经理程清洋，工会主席周清培，培训部经理关秀云，东客房部经理赵联发，南京饭店餐饮科负责人、现任河北饭店总经理张敬贤。

### 平等

北京饭店的老人们，差不多或多或少都和总理打过交道。北京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中，中央和国务院的很多重要会议以及重大的国务活动都在北京饭店举行。总理吃饭几乎总是最晚的一个，有时在小餐厅里单独给总理准备一下。总理来了，我们“书记们在哪儿吃饭？”在大食堂。“我去食堂，有大家一起嘛。”到了大食堂，总理看有几桌还没有吃，就叫服务员铺上桌子，几个人吃几个的菜，每次都是先交饭票，不让加菜，还安慰我们：“菜不多嘛，够了，不用添了。”

总理对搞特权深恶痛绝，他自己不搞，也不准别人帮倒忙。四届人大期间，西藏代表住在北京饭店。一天，一辆西藏代表的车刚到，正好总理来理发，随后也到了。负责保卫工作的周树松忙打手势，让代表的车往前行，腾出门口，好让总理停车。总理一下车就火了：“你刚才弄的谁的车？不知道？不知道谁敢欺负我客人？少数民族代表应该让下车，我等一下怕什么？快去把代表请回来！”代表来了，总理亲自向他们赔礼，一再请代表先进大厅，代表非常感动，哈腰施礼说：“还是总理先请！”总理说：“你们是远方来的贵宾，让我赶快先进。你们如果不进的的话，我就只好回去了！”到了理发室，总理叫住大周批评道：“你们不会做保卫工作！你们到搞神秘主义，搞特权，让我周树松累死！今天这件事怪不得我不对了，简直让人看不下去！”这一顿责，大周一辈子也忘不了。

### 认真

总理说：外事工作无小事。工作要过细过细再

过细。总理工作严肃认真，最容不得“大概齐”

“差不多”、“可能”、“也许”这一类字眼。

北京饭店举办过多次涉外宴会，每次宴前，总理都要了解一下饭菜的准备情况。一次总理问老总：“今晚的点心什么馅？”老张随口答道：“大概是三鲜馅的吧？”这下可惹了总理追问道：“什么叫大概？究竟是，还是不是？客人中间如果有人对海鲜过敏，出了问题谁负责？”

总理记得饭店许多工作人员的名字。他握手劲很大，时间很长。十年大庆的时候，来了很多外宾，搞接待的同志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总理特意来慰问。有一个叫李世宽的小伙子，刚结婚，总理笑着 said：“把新郎官扣在这儿于心何忍？忙过不要忘了他结婚。”总理的眼睛能够注意到每一个角落。过去饭店对陪礼服务的翻译照顾不够，光给一杯水，没有小吃，也不上毛巾，后来总理发话：“翻译人员责任重大，工作很辛苦，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可以在茶几上放几样点心，让他们抽空吃一点。”

### 廉洁

都说总理律己很严，严到什么程度？就拿吃饭说，国宴请外宾是一回事，总理自己吃饭则是另外一回事，一碗鸡丝面，一点花生米，几片薄薄的酱肉，非常简单。如果是素汤面，顶多两片生炒小菜。量不能大，够一人吃就得。总理最反对剩菜。我们看总理吃得太清快了，心里过意不去，可是都知总理说过的脾气，谁也不敢去劝总理不吃。

总理吃饭说，该付多少付多少，没有“象征性”一说。理发刮面也好，请朋友酒也好，晚上吃个冰激凌也好，包括周围的部长们和朋友们吃的，总理都要付钱，每次都问秘书：“算账了没有？”而且每次都要开发票，少一点也不行。有一次开会，天气比较凉了，总理请在场的同志喝茅台，第二天问警卫员：“昨天的酒给钱了吗？”“给了。”“多少钱？”警卫员一下没答上来，总理马上让查是不是漏交了，后来找到发票才放心。

# 参天的大树长青

## ——怀念周恩来同志

张光年

强大的说服力，使人听了解渴，增强了艰苦奋斗的信心。而在曾家岩（有时也在天官厅郭老会的会客室）的亲切谈话，更使人感到温暖的温暖。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记不太确切，但是皖南事变后的一段切身经历，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

#### 皖南事变后一段切身体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时局险恶，重庆笼罩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气氛中。去延安的路不通了。南方和周恩来同志正帮助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和东南亚其它地方。一天下午，周恩来同志的文化秘书张闻天找到我，说组织上得到确实的消息，一份特务机关的黑名单里，我的名字下面括弧中有“捕杀”二字。估计一时还不会动手，但必须疏散出去。第二天，乃超同志带我去曾家岩。当时我所熟悉的几位同志都准备去香港，我也想去，那里熟人多。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你不去香港，你去仰光，那里人少，需要一些同志去开辟工作。”我说：仰光在哪里，怎么去，我都不知道。意思还是想借熟人去香港。周恩来同志并不正面做说服工作，而是递给我一封为我写的介绍信。信是写给昆明西南大学农学院一位教授的（恕我不记住这位教授的名号了），用的是国民党党员的信封，封的下落落了个“周”字。一张国民党政党的八行信纸，用顺行横楷（不知是哪位同志毛笔书写的）疏疏落落了写了几句“请予照顾”的话。信内的署名是一个“阮”字。周恩来同志解释说：这位胡教授是他中学时候的同学，后来也到法国勤工俭学，私人感情是很好的。胡教授后走上政路，离开了党，离开了政治生活，可还是个好。人。“1937年，他跑到延安找到我，说是别的干不了，要有同志到昆明需要帮忙的，他一定尽力而为。他到延安，也为表明这个心意。你看，这是很好的吧？你到昆明，他要替你找住处，找车子，帮助路费，你都可以接受。”我见周恩来同志亲自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没有二话可说了。

我从重庆到昆明的旅程，充满了艰难险阻，这里不说了。到昆明后，赵凤、李超同志陪我去看望过云大的胡教授，带去了周恩来同志的致意问候，可是并没有接受他的热情帮助，因为经过到的渠道，找房子、找车子这类事情都已得到解决，就不用麻烦胡教授了。

周恩来同志对于原属第三厅、一直在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孩子剧团的同志们，也是关怀备至的。我还记得，皖南事变后不久，文化界开始疏散的时候，我到曾家岩去。周恩来同志见到我，高兴地说：“昨天孩子剧团一批人送走了，这是（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的最后一趟车，这下放心了。”在江南和西南活动的几个江南剧团的党组织，自抗日战争后期到全国解放前夕，遇事都能向南方局汇报，在关键时刻得到

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印象较深的是日本投降后援救剧宣二队（即原来的抗敌演剧第三队）一批同志出狱的事。1945年1月，剧宣二队的十几位同志在山西被阎锡山的特务机关逮捕，他们在狱中进行了非常艰苦而又机智的斗争。该队派代表到重庆，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接见，徐冰、乃超等同志的帮助，重庆新闻界、文化界的声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斗争，趁1946年3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赴太原视察的机会，由前政治部长张治中出面说情，终于得到释放，后来分批撤退到华北解放区。

1948年，周恩来同志从河北平山写信来到到正定的二队诸同志，祝贺他们胜利归来。信上表扬了二队的党支部，勉励同志们总结经验，加强学习，继续奋斗。这时我也到那来到正定。周恩来同志要钱俊瑞同志转告：我和二队同志的工作，以后由周扬同志来安排。

#### 对文艺建设的细心关怀

全国解放后，万端待理。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长长的周恩来同志，比重庆时忙碌许多倍；但他对党的文化、文艺事业，还是关心爱护，不遗余力。文艺界不少同志，对此都有深切感受。

我于1951年初调到文化部艺术处，和周璇峰、马彦祥等同志一起，协助沈雁冰同志、周扬同志、田汉同志在戏剧建设方面做些事情。文化部面临着重在旧基地和战时体制的基础上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新体制的任务，头绪纷繁。我接手的，首先是改编文工团的任务。文艺部要把首都和各省、市、自治区数以百计的综合性文艺工作团（部）文工团另议）改编为人员精干，任务明确的正规化、专业化的剧院和剧团，把原来的一些戏曲剧团也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以整编，这在当时是文艺战线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牵涉面相当广，有些同志一时想不通。（“文化部大革”中，还有些人在小报上连篇累牍地批评周扬、张光年“扼杀了文工团”、这又别论。）也有地方主管文化宣传的同志，过去战争时期，一直习惯于用文工团的戏剧、音乐、美术、曲艺等多种方式去宣传当时当地的心情（这在今日当然是很需要的），他们不大赞成改编文工团，怕“违反反了反方向”了。而刘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重视这次的改编工作。少奇同志说：“再不能让这些年娃娃们天天打腰鼓了。学不到一项专业，长大了会埋怨我们。”（大意）周恩来同志多次听取文化部的汇报，提醒多做思想工作。他一再把改编文工团工作会议的各地有关负责同志邀到中南海，针对一部分同志的思想顾虑，各敞其胸地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直到这项任务顺利完成。

在大家的印象中，总理进客房的次数极其有限。一次，总理去大使馆参加宴会，中途到饭店用了下客房里的卫生间，出来拿出4块钱，让饭店饭店服务员交，大周很为难：“这个钱怎么下账啊？”“糊涂！既然开了房门，服务员就要重新打扫，别人付出劳动，我怎么可以白白享受？”记得是1955年秋天，总理已经病得相当重了，“四人帮”整总理搞借家住在劲头土上，总理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天，总理提出要到饭店的17层楼看一看北京的同学，吃一顿西餐，休息几个小时。饭店同志给总理开了一间特等房，接总理上了电梯，邓大姐也一起来了，总理强撑病体，隔着玻璃窗来回转了一圈，看到那么多的楼，挺高兴的，临走时，不仅付了房租，还付了三个多小时按半天天的钱，服务人员执意不要房费，总理看全国人民操劳了一生，晚年被迫害成这个样子，总理看不了行，还能来这儿几次呢？怎么忍心要总理的钱呢？推来推去，最后王队长流着眼泪说：“快收下吧，不要让总理生气，”还是把饭菜送来了。

### 榜样

总理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吗？不，总理留下了一股正气，留下了一种精神。它对各级干部依然是一位光彩照人的一种榜样。

四届人大结束，总理主持了最后一次大型招待会，中外来宾上万人，都想看一眼周总理，后边的人站在椅子上，黑压压地站成一大片。总理致词的时候，会场鸦雀无声，鼓掌掌声雷动。

为什么总理能压得住阵？这个问题很值得好好想一想。

那时候有总理在前边比着，各部委的领导、国务院领导、中央委员们都来北京饭店吃饭，都是自己掏钱。那会儿饭店不是经营实体，不讲盈利，饭店就是为中央领导和国务院领导服务的，可是由于总理建立了“殷勤领导”的规矩，到今天，我们北京饭店的管理制度中还保留着总理不占公款便宜的风范。

听了北京饭店几位同志的回忆，我们按自己的感想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今天，我们更需要发扬周恩来同志这样敬业廉洁苦公的精神。

的高级干部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准备随时愉快听从深夜的召唤或电话的指示与询问。我曾多次到周恩来同志邀集的夜晚谈话（或曰凌晨小会），敬附末座。谈得晚了，有服务员送来热毛巾、热腾腾的包子（每人两个）或者都到后面餐厅，每人吃一大碗肉丝。我不仅一次看到，周恩来同志将头斜靠在椅背上，用一条条冷毛巾轮流按在额头上，用来抑制头昏脑胀。看到这样子，大家说今天不谈谈了。但是不行，还是要继续谈下去。我列席这样的夜间谈话，首先在思想上得到教益，同时也意识到，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是可以随着重大责任感的极度增强而开掘下去的。这对我也是精神感召力量。

周恩来把总理描写为苦行者，拒绝片刻休息的人。除了首都北京，他还是喜欢看戏的，看完了也同导演、演员们谈戏。看者北京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及其它剧院的艺术家们，可以写出若干篇生动的回忆。我还记得，1954年5、6月间，我随周翰章同志率领的一个文化代表团访波兰，适逢周总理也去波兰，我们在华沙的波兰大使馆见到他。当时我们一行人——周翰章、柯仲平、吕驥、蒋天佐和我都穿得深蓝或褐色中山服，周小燕也穿着朴素。一见面，总理就笑着以埋怨的口吻批评说：“一堆乌鸦！一堆麻雀！”大家给他留出座位，他坚持不肯，一定要把吕驥和周小燕拉到上座。刚谈到我们代表团的日程，他问：“你到过古城里那家中世纪的酒店吃过老啤酒吗？”答曰：还没有。这又惹来批评了：“还是文学家与艺术家嘛！那是过去波兰诗人、作家常去的地方，是很有风味的。”可见总理已经去过了。第二天，我们遭翻译团去这家重修后一切都恢复18世纪原状的酒店，坐下来品尝品尝那别有风味的啤酒。我拾起这些零星回忆，为的说这些话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普通人，他是平易近人的。他思想有时休息头脑，跳跳舞，品品酒，逛逛公园，可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 周总理“反左”、“文革”时

进入1957年及其以后的风雨如晦的年月，我能写些什么呢？我只知道，这期间涉及文艺界许多事情，他很少插手。插手也谨慎，例如1961年起到在“左”的广大会议及《文艺工作》（我只赶上《文艺八条》的起草工作），有什么实际作用呢？我仅到了1965、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前夕针对“四清派”的文艺整风，就干脆不放手了。张春桥狂妄地叫喊：“我们上海有些领导是通天的。这次希望中央的同志来管！”他指的是赵丹、黄宗英、张瑞芳等同志。他们常来北京，星期天有时应邀到周总理和邓大姐那里作客。张春桥等对这些同志视若眼中钉。

这里，我补记下一件事情。1957年夏天，反右派刚开始，一天下午，我随周扬同志去中南海。周恩来同志要我们试提划分右派的标准。他举出喜欢放言高论而又常讲错话的一位文艺女画家为例，问我们此人是属于右派否。我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位同志的错误言论，题目上写明是同志式的批评，通篇还称他为同志。周恩来同志，他刚看过这篇文。我说，所以这样写，因为我认为单凭这些严重错误的言论，还不宜划为右派言论。我主张要有右派思想、右派言论的人同那些不但有右派言论、而且有组织、有活动的人区别对待。对前者，批判他的右派思想。对后者，划他为右派分子。周扬同志是知道这些意见的，也说过这个意见可取。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你这个意见很重要，可以避免扩大化”可是，这次谈话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反右派运动发展迅速。不但那位画家很快划为右派，而且不少言谈错误比他错得多的，也作为右派处理了。我再也曾坚持原来的主张，而是背叛了自己的主张，积极赞成到那个反右扩大化的行列，混淆了两种矛盾。等到“四人帮”倒台，周扬同志从监狱被放出来，我第一次到中南海招待所看望他的时候，回忆到1957年的这段经历。周扬同志说：“总理当时赞成你的意见，我想他应反映这个意见，为什么没有下文呢？”我说：“当时恐怕是听不进去的。”

“文革”十年中，我根本看不到周恩来同志，只听说他处境困难。他这棵参天大树，总想见得多多少少荫蔽一些遭受狂风暴雨袭击的老同志，而大树本身也常为袭击的受害者。那时，“四人帮”通过他们掌握的“中央专案组”，千方百计要造成反叛叛徒、特务或托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也不只一次认真地想到死。逢到这个时候，我理想里，周恩来同志是了解我的。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到这个。这个思想，支持我咬牙渡过了险关。哪里知道，文艺界一些好同志，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要保护下一代的，越是遭到那些搞极端的仇恨。如周横道的话剧艺术家孙维世的惨死，即其一例。我后来知道，周恩来同志不只一次在某种会议上说过：“张光年，我是了解的。”大约1973年春天的一天，当时听到传周的同志，甚至到我家里来道喜，说那也不会有一什么结果。“四人帮”倒台后，我问指家李德伦同志说：江青要求中央集团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从从头到尾改写一遍，要他带一个小组来干这件事情。这是个苦差事。好容易搞出来了，也开始排练了。他心里想，这件事无论如何得报告周总理。他托人抄出一个大本子，一边是原词，一边是改填的新词。他都看过了。周恩来同志戴着帽子翻翻。翻到他熟悉的《保卫黄河》，生气地说：“‘风在吼，马在叫’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改成‘红旗飘，军号响’？要改，也让原作者自己来改。”李德伦汇报说：“原作者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干校劳动。”周总理说：“可以让他回来嘛。”他那时当然回不来，而且还为《黄河》歌词的“罪行”遭受批斗。我把这个插曲，在这篇回忆文章也记下一笔吧。至于参加集体改词和参加批斗的同志，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早就说这棵大树不能倒，倒下时必然地裂山崩。周恩来同志的死亡，邓小平同志的掌理，一批开国元勋的惨遭迫害，直接引发了浩气凌云的天安门事件，导致“四人帮”的灭亡。1976年1月，我和文化界的一批劫后余生的同志，悲愤愤地向周总理同志的遗体告别。事后写了长诗《惊闻总理逝的1976年》，在首都人民有馆万人大会上朗诵。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文艺界的同志们，无论在工作顺利时候或不顺利时候，对周恩来的怀念是久而弥深的。我们心头的参天大树，是久而长青的。我在这个年初写下这篇，就不仅是表达我个人的崇敬和哀思了。

### 回执

单位：  
地址：  
参加会议人数（男 人，女 人）  
预计订货型号及数量：

回执请加盖公章，务于3月10日前寄出，以便发商安排食宿。

董事长：宋屏轩 经理：杨永仁 向您表示敬意，欢迎您选购本公司产品，愿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